



阿摩司·奥兹《乡村生活图景》：

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相信大家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重要，经济和科技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与另一个文化、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明产生亲密的关系，你就要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你访问了一个国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国家有名的景观、建筑物，认识这个国家的人，品尝它的美食，照几张照片，然后你就回国了。但如果你阅读来自于另一个文化的一本小说或一个故事，你就会受邀进入他们私有和公开的记忆中。阅读另外一个文化的故事，就好像是受邀在别人家做客，不一定在会客室，而是在比较私密的厨房或者餐厅甚至卧室里，普通的旅游肯定不会这么幸运。所以，我的编辑、翻译和出版社所做的工作就是搭建两国文化的一座桥梁，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桥梁更让人兴奋，比万里长城的作用还要大。我们在这个星球最古老的两个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记忆、最古老的经验。中以两国很不一样，但我相信中以两国之间是有共同点的，两国的历史都充满了悲惨和痛苦，也同样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愿意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两国也有各自尊崇的价值观，两国价值观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要阅读对方的文学作品。

我的新作品《乡村生活图景》实际上基于很多年前我做的一个梦。梦中，我当时正走过以色列最古老的犹太村庄之一，这个村庄可以说比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还要久。在梦里，这个村落到处都是空旷的，包括田野、农庄、房屋，所有都空无一人。梦中，我可能是在找一个女人，突然梦做到一半的时候，又变成她来找我，所以我想要逃跑，要藏起来。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作出决定，下一本书的故事就要布局在这样的村落里边，我也知道这本书应该

是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好是要写小说还是一系列短故事的集合。但我跟一位优雅的女士（奥兹的妻子尼娜）结婚56年了，我会很妥协，所以《乡村生活图景》也是妥协的产物。书中包括了8个短小的故事，但读者也可以像小说一样去阅读它，因为8个故事中的7个都是在同样时间段发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读者会发现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会在另外一个故事中出现，突然觉得这个人是我之前认识的。

这本书是关于梦、失去、藏匿、寻找和搜索的。这些主题并不是以色列人独一无二的经历，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遭遇过非常痛苦的失去呢？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遇到不期而遇的惊喜呢？我的人生中是不是也有想要逃离的经历呢？我有没有在生命中不断去搜寻某一个人呢？你会感觉到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丢的到底是什么；同样有人可能在搜寻，但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有人可能在害怕，但不知道具体怕的是什么；有人在希望一样事物，但是你要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人也说不出来……我想要问，你是不是熟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熟悉这种感觉，我们忘了一件东西，然后又忘了自己到底忘了什么，但我们会一直记得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乡村生活图景》这本新书要带给大家的。

我也会讲到梦想。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背景肯定都会与它的历史、地理、人口和政治有关，但是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从梦想当中诞生的，以色列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是立足于历史地理政治人文，而是立足于梦想之上的国家。很多很多年前，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在人们甚至相信有以色列建国这个可能性之前，犹太人的国家是写在欧洲



小说家作品里面的。在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前10年，还没有一块基石，只是空旷的沙漠上布满了沙子，特拉维夫也还只是存在于作品中。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到他们热爱的故土之前很多年，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也是写在小说里的。书籍可以旅行很远，它们可以创造现实，影响现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梦想开始的，我的这本书也是因为梦才写出来的。

如果想要理解以色列，就必须考虑到以色列不是创立于一个梦想之上，而是基于很多人不同的梦想，有些梦想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些人设想我们可以创造《圣经》中的犹太国度和犹太辉煌；但另一些人并不很在意《圣经》里怎么说，他们希望建立现代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创造者希望建立中产阶级的国度……为什么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愿景和计划，以色列还能成立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建筑物，由不同的建筑师设计蓝图建造，这样的建筑是会倒塌的。但以以色列这个建筑并没有倒塌，是因为不论梦想有多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就要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遥远的耶路撒冷的家。50年之后、100年之后、150年之后的现

在，这些迥然不同的梦想变成了什么，几乎所有的梦想都仍然鲜活——它们可能有所改变，但仍然鲜活——有些可能变得更加实际，也有一些梦想更加理想化，但几乎所有的梦想在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当中都仍然存在。

关于民族团结、关于和谐、关于共识，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不希望有一致的意见，以色列社会就像是街头缩影，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差不多有800万人口，这800万以色列人就好像800万总理、800万教授、800万的中产阶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式，用这个公式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每个人都在跟其他人宣讲，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倾听。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倾听其他人的故事。我在以色列听到很多东西，一点都不喜欢，也有很多人一点都不喜欢我，以色列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些亲戚甚至认为我是这个家庭的耻辱，和一些人同处一个“家庭”中我也深以为耻。但这没有关系，我喜欢以色列的多样性，我喜欢发出不同声音，我不希望以色列像一个独奏的演唱会，我希望它是合奏的音乐会，而我本人也不总是喜欢音乐，我很喜欢批评某种音乐。但如果有人和我找到到一个解决方法，可以让以色列的每个人都喜欢我的方法，都会唱我的歌，我会说谢谢，我不需要。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在以色列属于少数意见，我是不是想让大多数人接受我的想法呢？当然是了。但我不想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接受我的想法呢？天哪，绝对不要这样。上千年以来，即使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的文化中就有质疑和争议。我们不是很尊重权威，有很多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和对价值的思考。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中永远都不会只有一个“教皇”，每一个犹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翻来覆去地看每一块石头。犹太人的文明就是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的文明，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犹太人，包括摩西和耶稣、斯宾诺莎和卡夫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卡尔·马克思……他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之父，但这些伟人又背叛了他们的“父亲”，我相信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父亲或老师可能对小孩子说，听我的话，这就是事实，几代人都遵从这样的事实，但有时这个小孩小女孩会说，是的，我知道每个人认为这就是事实，但是我自己想要试一试，我可能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反叛可能会带来愤怒和反感，但正

是这样一些人会改变世界，通过宗教、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经济来改变世界。

举一个《圣经》里的例子。上帝不喜欢索多玛这座城市，决定要把他从大地上完全抹除，但亚伯拉罕与上帝有不同意见，他就对上帝说，如果索多玛里有50个好人，你还想毁灭这座城市吗？上帝说这座城市太糟糕了，你绝对找不到50个好人。亚伯拉罕继续说如果40个人、30个人、20个人甚至可能有10个人是好人呢？他好像推销二手车一样，跟上帝讨价还价，他不觉得羞愧，也不害怕；输掉了和上帝的争论，他也并没有跪下来恳求上帝原谅。亚伯拉罕在向上帝表达的是，你是宇宙之主，创造整个世界，给我们法律，但是您本人不能超越法律，这就是最好的时候所有犹太文化的中心，当然并不是每个时候都这样好，犹太人有时也会妥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保守的，几乎没有创造力。但在好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创造力的源泉就在于此——不要对某件事情引以为然——即便上帝说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试试看会不会有其他的角度、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这件事。所有人都曾经是孩子，我们都曾经见过一幢大楼前写着“小心！油漆未干”。我们是孩子时，哪怕看到“油漆未干”，也还是要摸一摸，这就是创造力，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犹太人带给世界文明的礼物。世界上每一本小说——不论是犹太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都是一根纤细的手指，要伸出去试一试油漆到底有没有干。

最后我要说，我个人信仰的是好奇心，我相信好奇心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非常重要，我也相信好奇心是崇高的道德之翼。我一直都相信，有好奇心的人比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好。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好奇心的人会问，如果我不是自己而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会怎么样呢？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事情会伤害我；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高兴……好奇心有时会把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抹除全部存在，而是拓展你的视野。有好奇心的人会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更好的爱人。我本人的好奇心让我成为了一个作家，也是好奇心让大家成为优秀的读者，可能有一天也成为一位最优秀作家。

(本文根据阿摩司·奥兹在《乡村生活图景》中译本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



蓝翅街笔记

2016年春，在瑞典，北欧文学教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艾芭·维特-布拉斯特罗姆振臂呐喊，媒体跟进，大众围观，有关蔑视女性、自大自私自的文化权威——“文化男”的辩论掀起狂澜。几位“文化男”被点名批评。接着，因为维特-布拉斯特罗姆教授出版了一本描述老年夫妻之矛盾和争斗的男女对话录——小说《百年爱的战争》；因为女教授和前夫离婚未久；更因为她的作为文化权威的前夫也出了本新书，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不由自主地被拖上场，无意之间变身“文化男”大讨论姗姗来迟的男主角。

“最后一头猪”

恩格道尔的这本书《最后一头猪》，封面背景是墨绿色的森林。前景是个酷似恩格道尔的人，一个审视前方，半醒或半疲惫的半老男人。内页是红色硬皮。

一个男人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或者，将人生比作乐章，他正奏响的这个乐段，曲调并不欢快。他67岁，正向老年迈步，刚刚割筋切肉，走出长达25年的婚姻。他几乎是神坛上的人，有10年时间，是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在那漫长的10年里，总是他，在10月的某个中午，推开门厚重的门，用好几种语言向全世界宣布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名字和获奖理由：这是恩格道尔掌握的文化资本和占据的文化权威的象征。

没人能否认恩格道尔是个博学和智慧的人。即便在他前妻的文学作品中，这个“他”，一个被认为带有恩格道尔标记的“他”，一面被有失公允、不由分说地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一面也还是闪烁着智慧——这不得不归功于恩格道尔个人的文化实力。

同是离婚后推出的新作，恩格道尔的这一本内容比他前妻的广泛。他一如既往地言必称希腊、罗马、荷马、但丁是其师友，而歌德、恩格道尔说，其实是“我的父亲”。这么一来，好处是很显学问和深度，坏处是难免负重前行——很难推开那些死去的大师们，完全自由地让思想驰骋。他谈生活、衰老、死亡，谈艺术和文学，也谈男女和情爱，有他为人熟悉的精英式机锋；只是这一本基调苦涩，妇女观也不那么正确。但道德上的圆满和政治的正确从不检验书籍的标准，更不会恩格道尔的。他似乎不打算讨好谁，或者说，他似乎乐于捍卫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调子和口味。书唤做格言体，恩格道尔似乎觉得这归类差

“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

□王 晔

强人意，一再补充说，更准确的叫法是“思想的碎片”。一句两句，一页半页。他为此些碎片养成了随手带笔记本的习惯，甚至在梦中，就像梦呓。他说，“卡夫卡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没结婚却能写出《审判》。”他说，“一个作家得乐于背叛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以找到自己的调子。”他还说，“作者和读者的视线永不相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文学存在。”

生活随时随地给他灵感。一段中国上海的旅行也可以。

在上海，高楼大厦的城市，谈论着一个自杀的人，在其长长的坠落到地面的路线中，自杀者接听了响动的手机，回了话。人们强调说这是一个女人。

像是两句话组成的短小说。恩格道尔到中国上海迄今只有一次。生命的重力，女性，说话，坠落的路线，死亡。不大可能是真正的上海流言，更可能是恩格道尔把一种人生的惆怅织进魔都上海的幻象。缓慢坠落中的自杀者形象或更合适一位不堪重负的中老年男性。而一个在向死过程中接听电话的人，按恩格道尔推测，却只能是女性——也许是说女性更有尘世的责任和牵挂，但更可能只是说，女人永不能放下交谈需要。恩格道尔表示过，他厌烦女人在电话里喋喋不休。他其实还有更多激起女性不满的言辞：

在一个年轻男子的心里，有个最深处的房间，这里只给一样东西留了位，也就是说给他自己。想期待些别的，或要求些别的，眼下或任何时候，都是痴心妄想。

在年轻男子们的心中内室里找不到位置的所有那些其他的一切，都被安置在等候室。那里坐着他的女朋友、他的野心、社会、上帝和魔鬼。也许有一天他们可以来抢占，也许不会。但眼下，那间内室是被最神圣的占据了。上帝对此不生气，所以其他人也不会。

往后，这不再年轻的男人快死了，他意识到，那些其他的一切占据了自己内在的房间，却把他挤到了等候室。这是时候，他意识到，是时候熄灯、走开了。

在一个年轻女子的心里，有个最深处的房间，这个中心是空的，甚至连她自己也不在里头。她坐在外头，等待某个人去填充。于是，来了朋友们、男人们、孩子们、社会、上帝和魔鬼，让她遂了心意，她走进去，找个位置，和这所有的

她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她意识到她在里头独自一人。那些进来过的又都走了，假如她并没赶他们走。于是她明白，是时候熄灯、关门了。不过，她先写下几行感想也不错。男人们的孤独我们已知道全部。这种把男和女区分，公然声称他们截然不同，特别是认定女性的心中内室原本空无一人一句，让一些瑞典女性惊诧和愤怒。我倒觉得，若不断章取义，会以恩格道尔不无道理。因此特意全部抄录于此。

我们见识过不少心中惟有自己年轻男子，和心中只期待给自己带来生活重心的人，也就是说“丈夫和孩子”的年轻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日渐老迈的男子而言，其他的一些变得日渐重要。男女内室的不同并无太多高下、对错之分，也难以厘清多少是上天的安排，多少是社会中的学习，但能肯定的是，这种不同构造的内室多少存在。

恩格道尔不喜太多人围绕自己，他曾“试图想想我离开人堆后他们感到解脱的样子”。他是充满矛盾的精英，他强调精英的趣味，但善于和精英共处，认为和他们在一起，“好比关在停电的电梯里”。到了人生不再年轻的阶段，他不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而似乎把人生看成一出矛盾、无奈又荒谬的戏剧。《最后一头猪》书的最后，收录的是一出题为《桥上的人》的独幕剧，是个年龄不明的男子的大段独白——基本还是格言体。而这本书的全部，可能就是恩格道尔主演的独白戏剧吧。

旧火新柴

“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一出红与黑的对垒。

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夫妻，从战友到对手。俩人都表示离婚后全无联系，对前任的新书毫无兴趣。但以红与黑的方式联袂登场似乎不仅是巧合。或许文字的倾吐是熟年离婚男女疗伤的必须，他们同时经历这个过程；或许书商促成了一个巧合；或许生活原本处处有巧合？

读者难以区分哪些是文学创作，哪些是一对文化权威的生活投影。两位当事人在主动和被动中轮番现身同类采访和推介活动。他们已离婚，但在书店，他俩的书比肩立于同一张特别推出的展台。媒体推波助澜，人群集体围观，私人的文字



《最后一头猪》瑞典文版

倾吐演化成公共的文化事件。

必须赞赏他们对人生的直面。不再维系诺贝尔奖晚宴上的盛装合影，而是撕开伤口；虽然，所有的文字，特别是自媒体文字都值得怀疑——人会下意识美化有关自己的记忆。但毕竟，恩格道尔自觉地走下神坛、袒露疲惫，他应该不是为了自我暴露，更是为了满足读者对名人的窥探欲及图书市场和媒体世界对名人隐私的消费。作为文化精英，他或许有意无意地期待凤凰涅槃，想穿过一种破碎走向一种建立。他所显露的所有脆弱、无奈、痛苦就像他选择的格言体，像他对格言体的矛盾心理：“格言体有致命的弱点，假如某一句特别有道理，读者会觉得好几代之前早已有人这么说过。”恩格道尔的无奈和苦痛提醒我想起另一句格言：“人所具有的都都具有，人都有缺陷和压抑，所以都需要升华。”

“百年爱的战争”这个书名从芬兰籍瑞典语作家玛尔塔·蒂卡宁的诗集《百年爱的故事》那儿拿来。诗集描绘了蒂卡宁夫妇痛苦的爱情生活，男主角是个酒精中毒者。“百年爱的战争”几个字不难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四个字，联想起一百几十年前在瑞典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的

滚滚车轮下，在爱、婚姻、男女等议题下的人与人的纠葛。

相比于前妻更有“性别”和“革命”标识的书签，恩格道尔的书未纠结于一对男女、一段婚姻。很难说清“最后一头猪”这一标题的真意。恩格道尔本人介绍，书要出版，总想起个别致的书名，这是梦中偶得。就像书中格言，不少也是梦醒时立刻涂在笔记本上的。待恩格道尔细打量这头“猪”的来历，发现它还是来自读过的一本书。恩格道尔记得是普卢塔克《道德论丛》中的一篇。从荷马《奥德赛》的故事衍生而来。奥德修斯的同伴，几个希腊人闯入女神喀耳刻的领地，被喀耳刻变成猪。奥德修斯恳求喀耳刻把他们变回人形。喀耳刻认为奥德修斯不该自以为是，叫出其中的一头猪，让奥德修斯听听其意愿。这头猪不肯变回人，向奥德修斯论证，动物在许多方面比人类更胜一筹。比如，它们在斗争中更具朴实和天真及赤裸裸的勇气，它们无须召唤也不怕遗弃，从不祈求或索取同情，等等。无论是什么让恩格道尔认领了这头猪的形象，这形象一定暗合他的某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深层心意。他想从喧嚣的人群中迹述吗？他自觉是一头喘息着的赤裸也无畏的猪吗？他有讥刺的调子，精英的傲慢及不那么正确的女性观，有被指认为“文化男”的危险，索性戴上这顶帽子，自嘲地做那不求同情的“最后一头猪”吗？不得而知，但在这本书里明确说：“我得回顾一句旧课本上的话：假如猪能说，我是一头猪，那它已经不是猪，而是人了。”

维特-布拉斯特罗姆笔下的“她”疾呼自己不是狗，恩格道尔的“我”却赖在一头猪的身形里。“人”这一他们在现实中背负的形象过去，不能说不荒诞。或许人类并未进化很久，历史其实毫不久远。100多年前的北欧剧坛上，斯特林堡写过《死亡之舞》，易卜生写过《玩偶之家》，和他俩几乎同时代，当时很轰动，长时间未如男剧作家一样被同等地谈论，近年又再受重视的瑞典女剧作家安·夏洛特·莱福乐写过《家庭的幸福》。所谓“家庭的幸福”包括婚姻的幸福和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是历经百年尚未讨论出光明大道的议题——也因此，这些剧作家的作品至今仍未过时。或许，恩格道尔和维特-布拉斯特罗姆是在当今时代，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添加了新柴。妇女的解放和婚姻的幸福并非打倒或审判“走向没落”的“文化男”那么简单，但也许需从评点“文化男”入手。浏览这两本书，我看到不完美、不可能完美也无需完美的饮食男女。他们像多数人一样需要改进，改进自己，改进交流的方式和可能缔结的作为人、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恩格道尔有关密室的譬喻提醒了某种捷径——改进的第一步，或可从男女改变密室的构造开始。